

研究法家教育思想參考資料

历史上儒法两条教育路线斗争概况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一九七四年十月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古为今用。

目 录

历史上儒法两条教育路线斗争概况

前 言	(1)
一、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	(3)
二、秦汉时期儒法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	(23)
三、唐宋时期儒法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	(43)
四、明清时期儒法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	(60)
五、几点体会	(72)

法家和儒家教育思想言论摘录

一、复古倒退还是厚今薄古是儒法两条教育 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	(81)
二、知识、才能是生而知之，还是学习、实 践而后得，是儒法两种教育观的根本对立	(91)
三、搞“师道尊严”，还是“距师核道”， 是儒法两家夺取教育领导权的斗争	(102)
四、培养复辟倒退的卫道士，还是培养敢革 新的法治人才，是儒法两家在培养什 么人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111)
五、灌输“六艺”之文，还是“以法为教”， 是儒法两家在教育内容上的根本对立	123)
六、闭门读书，还是学以致用，是儒法两家 在办学道路上的根本区别	(134)

历史上儒法两条教育路线斗争概况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前 言

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历来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路线，就会有不同的教育；反转来，不同的教育又都是为不同的阶级和政治路线服务的。历史上儒法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的反映。斗争的实质都是围绕着把教育做为那个阶级专政的工具，为那个阶级、那条政治路线服务的问题。今天，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正如列宁所说：“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由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决定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过去的教育作为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是剥削阶级赖以生存和借以复辟的一个顽固堡垒，也是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精神支柱，是教育领域出现复辟资本主义反动思潮的重要根源，这就必须彻底清除这块基地。因此，在教育战线要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最重要、最根本

本的是继续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法家的教育思想，批判儒家的教育思想，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为批林批孔服务，为推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为当前教育战线上的现实斗争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也是十分重要的。

“法家无教育”论，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独霸教育阵地所制造的反动舆论。他们一方面把孔老二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把他的教育思想说成是“我国教育方面的重要遗产”；另一方面却对法家教育家进行恶毒攻击和歪曲，许多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包括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御用文人，胡说什么法家“没有象样的教育家”，法家“不重视教育”、“全面毁灭教育”等等。就这样，一部中国教育史完全贯穿了一条尊儒反法的黑线，完全变成了儒家的一统天下，成了一部被颠倒了的历史。事实上正好相反，法家教育家少正卯、商鞅、荀况、韩非、秦始皇、王充、柳宗元、王安石、张居正、李贽等等许多法家代表人物都曾适应历史的发展提出过许多教育改革主张，在为法治政治路线服务，促进历史的发展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他们才是真正的教育家。这个历史的颠倒必须重新颠倒过来。

下面仅就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几个时期儒法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一些情况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

（一）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概况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动时期，是反动腐朽的奴隶制逐步崩毁、新的封建制日渐兴起和确立的时期。

在这社会大变动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经济、政治、思想以及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都是十分激烈的。这些斗争，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春秋末期，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摧毁奴隶制、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奴隶暴动和起义不仅破坏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即“井田制”，并且动摇了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出现了“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形势。奴隶起义对教育这个奴隶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当时奴隶起义的著名领袖柳下跖义正辞严地痛斥孔老二的事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柳下跖坚决批驳了孔老二效法先王、复古倒退的反动主张，认为孔老二吹捧的所谓“圣人”的行为“乃甚可羞”，这些“圣人”全是些欺骗人民，使人民不得安生的“乱人之徒”。柳下跖尖锐地批判了孔老二当作“仁”的根本的“孝悌”之道，认为这全是欺世惑众的谬论；孔老二“妄作孝悌”是想当富贵的诸侯，是为

了统治人民；那些被孔老二捧为“忠臣”、“贤士”的人的所谓“德”行，只能“为天下笑”“皆不足贵也”。柳下跖对那个把自己打扮成“天生的圣人”的孔老二，痛斥为“罪大极重”的“盗丘”、“盗莫大于子”，是鲁国的“巧伪人”，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是“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的反动政客。柳下跖对孔老二的斗争代表了奴隶们对奴隶主贵族教育的有力批判。

在奴隶起义的推动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新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产生了，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封建地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新兴地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积极推行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而奴隶主阶级则力图维护和复辟奴隶制。这一斗争在政治、思想上的集中表现，就是法家和儒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儒家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推行一条反对社会变革，顽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主张“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宣传和实行一条变革旧制度，建立和发展封建制度，主张“法治”的进步政治路线。

儒法两家的斗争既表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思想领域，也反映在教育领域中。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教育“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领域中的斗争是由政治路线的斗争决定的，也是为当时政治路线的斗争服务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提出并推行一条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的反动的复古、倒退的教育路线，这条教育路线，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直到教育道路和方法，都是为“克己复礼”这一政治路

线服务的。他们利用教育阵地，培养“复礼”的人材，大造“复礼”的舆论，妄图达到“复礼”的目的。当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法家，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他们为了粉碎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反抗，促进封建制的建立，不仅从政治、经济上与儒家的反动路线进行斗争，在教育领域内也与儒家“复礼”的教育路线展开了斗争。这一时期法家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少正卯、商鞅、荀况、韩非。儒家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丘、孟轲。

春秋末期，法家先驱者少正卯（？——公元前四九八年）与儒家创始人孔丘（公元前五五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在“私学”中的斗争，揭开了儒法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序幕。战国时期，以商鞅、荀况、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与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在教育领域进一步全面地展开了斗争。

商鞅（约公元前三九〇年——公元前三三八年）是战国中期卫国人，后来到秦国，因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于商，称为“商君”。他继承和发展了前辈法家的传统，提出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他的著作，后人辑录为《商君书》共二十四篇。在《商君书》中，他严厉批驳了“礼治”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教育上的复古倒退路线，认为儒家鼓吹的那一套“仁义”、“孝悌”等是导致国家贫弱的思想根源，采取了“燔诗书而明法令”的革命措施；商鞅还坚决镇压了那些“以古非今”的反动儒生；在变法中，他奖励学习耕战，并且实现了“更礼以教”对群众广泛地进行法令教育，连不识字的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

荀况（约公元前三一三年——公元前二三八年）是战国

末期赵国人，当时人称他为荀卿或孙卿，是新兴地主阶级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曾三到齐国的文化中心稷下讲学，做过稷学宫的祭酒（校长），影响很大，著名法家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他的著作有《荀子》一书，共保存了三十二篇。其中《劝学》、《儒效》、《性恶》等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荀况对孔孟复古倒退的反动教育路线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批判。他针对孟轲“法先王”的反动口号，提出了“法后王”的革命口号，主张教育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服务；他针对孟轲鼓吹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来强调后天教育的作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力地批判了孟轲的“天赋道德论”；他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孔孟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认为一切知识才能都是通过学习和实践得来的，从而提出重视实践的学习道路。荀况在与孟轲反动教育思想的斗争中，使法家的教育理论、路线更加全面、系统起来，在这方面，他的贡献是很大的。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〇年——公元前二三三年）是战国末期韩国人，他总结和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法家思想，建立了系统的法家思想体系，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共五十五篇。韩非在他的著作中集中批判与揭露了孔学的反动性。他的教育思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深刻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对于社会进步或倒退、国家兴旺和衰败的巨大作用，提出在教育领域内实行对奴隶主阶级专政。他主张对儒家的书简典册要取缔，对贩卖孔孟之道的私学要禁止，对反动儒生要严加制裁。这种对儒家旧

教育要彻底改革的专政思想，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杰出水平，对以后法家的教育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先秦法家十分重视革新旧教育，建立新教育，重视教育对建立、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儒法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实质，是维护旧的教育制度，使教育为复辟奴隶制服务，还是坚持教育改革，使教育为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服务。

（二）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焦点

春秋末期，以少正卯为代表的法家先驱者同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儒家在私学中展开了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在奴隶制社会，国家的官吏垄断着文字，一切文献书籍藏于官庭，官吏就是教师，学校完全被奴隶主贵族所独占，后世称之为“学在官府”。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原来官府所藏的典籍文献，开始流散四方，而贵族的没落，养不起大批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流散到社会上与一些下降了奴隶主，上升了的小生产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士”，在当时的阶级关系变化和斗争中，他们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形成了各阶级在思想上的代言人，其中不少人开设“私学”，宣传自己阶级的思想，形成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学派，在这激烈的斗争中，“私学”逐渐发达起来。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孔老二等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办“私学”讲学的。

孔老二所办的私学，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他通过办私学，把奴隶主阶级“官学”的反动使命接了过来，妄图通过办学来实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纲领。与此相对立的，法家先驱者少正卯也同时在鲁国办私

学，他和孔老二同时讲学，唱对台戏。由于少正卯宣传法家思想，讲的是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新道理，对学生进行革新思想的教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以致有几次除颜渊外，孔子的学生都跑去听少正卯的讲学，出现了“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局面。（“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论衡·讲瑞》）孔老二的学生子贡也认为少正卯是“鲁之闻人”。这对以孔老二为代表的奴隶制复辟派威胁极大。孔老二对此怕得要命，拚命攻击少正卯是“乱政”的“小人之桀雄”，在他当上鲁国司寇并代行宰相之后，迫不及待地杀害了少正卯。从《荀子》一书中记载的孔老二给少正卯定的三条罪状看：“居处足以聚徒成群”（指到处煽动群众），“言谈足以饰邪营众”（指鼓吹“邪说”），“强足以反是独立”（指颠倒是非），都与讲学有关。孔老二杀害少正卯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少正卯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教育路线与孔老二是根本对立的，两者之间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也是革新与保守两条路线的斗争。

战国时代，是新兴地主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中进一步全面发动夺权斗争，进行社会政治制度大变革的时期，是封建制度在各国进一步建立的时期。这一时期儒法在教育领域的斗争深入、全面地展开。前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商鞅分别在魏国、楚国、秦国进行变法，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一系列改革的同时，在文化教育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对儒家的教育路线进行了批判。后期法家代表人物荀况、韩非，在继承前期法家思想，总结法家变革发展理论的同时，全面、深刻地批判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教育思想，系

统地提出了法家的教育理论和路线。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和儒家在教育领域的斗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法家主张“废先王之教”，反对儒家的“据先王之教”。

教育从来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办教育的目的是利用教育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服务。孔老二一生不忘当官“为政”，搞复辟。当他晚年官运不通，仕途不达，专门收弟子办教育时，是否“为教育而教育”呢？绝对不是。关于这一点，孔老二自己说得很清楚。一次，有人曾问他为什么不上台搞政治，他回答说：“我用孝悌教人，从而施加影响于当政者，也就是搞政治，何必亲自去当官？”（“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这就一语道破了孔老二办教育是为了“施于有政”，把办学与“为政”结合起来。孔老二“为政”的目的是“克己复礼”、复古从周，所以在教育上就竭力鼓吹“先王之教”。他认为对先王的遗教应该爱好和相信，只能阐述而不能创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他要求学生周礼要坚信并努力学习，誓死保护并爱好先王之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孟轲继承孔老二复古的思想，明确提出了“法先王”的政治口号，他说不是尧舜之道是不敢拿来向王陈述的（“我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孟子·公孙丑下》）。在教育上，他竭力主张“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庠”、

“序”是西周时期奴隶主阶级官学的名称，“孝悌”是儒家所谓“仁”之根本，是奴隶主阶级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就是说，教育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要恢复奴隶主阶级旧教育的一套。孔孟儒家鼓吹“据先王之教”的政治目的，就是要使教育为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服务。

作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法家，在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同时，对教育也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废先王之教”就是他们提出的响亮口号，其目的是使教育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法治”的政治路线服务。商鞅认为治理国家不是用的一个方法，使国家兴盛也不一定效法古代。（“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在文化教育方面，他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的革新措施，主张烧掉儒家的《诗》、《书》，使法令能够贯彻实行。商鞅还把捕获的七百多个破坏变法革新主张复古的旧贵族（包括反动儒生），全部在咸阳附近的渭水边上镇压了。这实际上是一次“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荀况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针对儒家鼓吹的“法先王”的复辟倒退主张，明确提出“法后王”的政治口号。他指出，儒家“法先王”的路线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荀子·儒效》），是打着先王的旗号来欺骗老百姓。荀况主张“百家之说，不及后王者，不听也。”

（同上）韩非继承发展了荀况的思想，明确提出要“废先王之教”。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社会是不断前进的，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处理问题的政策、办法也要有所变化。（“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他用这种进步的历史观批判那些在当今的时代，仍然根据先王的道理，用尧舜之道作为判断是

非的依据的人，不是愚蠢就是欺骗。（“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子·显学》），他讽刺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理当世之民”的人就象“守株待兔”一样的愚蠢可笑。在批判儒家复古教育路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子·五蠹》）的法家教育纲领，坚决主张取缔儒家的经典书简，把法令作为教育的内容；禁止宣扬先王之道的儒生做教师，而以执行法令的官吏为教师。这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在文化教育领域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的要求。

法家同儒家关于“废先王之教”与“据先王之教”之争，是教育为哪个阶级政治路线服务的问题。“废先王之教”不是象以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攻击的那样“不重视教育”“全面毁灭教育”，而是要彻底改革奴隶主阶级反动的旧教育，建立为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服务的新的教育制度。法家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例如荀况就特别强调通过教育这一专政的工具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他说“不教诲，不调一，则人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荀子·强国》）就是说通过教育，可以统一人的思想和行为，使兵强城固，敌国不敢侵犯。他还认为通过教育可以“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荀子·儒效》）这充分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要求，认为通过学习和教育，可以改变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由此可见，法家所要的教育是为社会变革需要服务的，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这条教育路线，与儒家那条复古倒退的反动教育路线，

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法家主张培养“更礼”、“变法”的人才，反对儒家培养“克己复礼”的卫道士。

为那一个阶级培养接班人，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这是教育为那一个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问题。

儒家为了适应复辟奴隶制的政治需要，在教育上就要求培养复辟奴隶制的“人才”。孔老二公开号召他的学生们去追求高官厚禄。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他的学生子夏把它概括为“学而优则仕”。但是，当时正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孔老二要学生去做那个阶级的官呢？这一点他是毫不含糊的。他给学生作官规定了一条原则，“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就是要以维护奴隶制的一套信条办事，如果不被采纳，宁可辞职不干。他的学生去做官，他是要在幕后操纵的，凡是听从他指挥，开历史倒车的，他就称赞不已。例如子游为武城宰，以礼乐化导于民。孔老二到了武城听到弦歌之声，把子游称赞了一番。再如子路在政治路线上死心塌地地追随孔子，为了削弱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特派子路到实力最大的大夫季氏那里当主管，具体执行“堕三都”的任务，孔老二对子路也是赞不绝口。凡是违背他要求的，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他就恨之入骨。如冉求被季氏任用，季氏要实行“田赋制”，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一项改革，事先冉求去征询孔老二的意见，孔老二认为这是违反“周公之典”的事，坚决反对，但冉求“弗听”，回去仍然帮助季氏搞起“田赋制”来，孔子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事，对冉求大

加谴责，并唆使其他学生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可见，孔老二要培养的是“仁以为己任”的“志士仁人”，就是要培养一批以复辟奴隶制为“己任”的官吏。孟轲也把培养“志士仁人”作为“施仁政”的重要措施之一，他认为这样做了，就可以内治野人，外抗强秦，复辟奴隶制社会就“可坐而定也”。

法家为了培养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首先对奴隶主阶级旧教育培养出来的儒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荀子称那些死读诗书而不行礼法的儒生为“陋儒”。韩非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反动儒生“修仁义”“习文学”“不外乎是为了取得君主的信任而求得官职，以达到篡权复辟的目的。他们“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他们满口仁义，称诵先王之道，用来扰乱当时的法制，动摇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他们是国家的“蠹虫”，必须把他们扫除干净（《韩非子·五蠹》）。与此同时，法家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出发，提出要为地主阶级培养“法治”人才。荀子说过，学习的目的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而对“士”和“圣人”的标准他解释为重视并且实行法治的就是“士”；以坚强的意志身体力行法治的就是“君子”；能做到“士”“君子”的要求，又能经过周密思考把法治理论理解到极高深的程度的就是“圣人”（“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荀子·修身》）可见荀子所谓的士、君子、圣人都是“明法”“行法”的法治人才。韩非等则提出要培养“智术能法之士”（《韩非子·孤愤》），即有智谋，有才能，明法治的革新家。他们要求“智术能法之士”，能够认清时代的发